

“中国式滞胀”与总需求管理失效

陈彦斌 刘哲希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速逐步下滑，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存在。2008~2013 年间 GDP 平均增速为 9.0%，CPI 平均同比涨幅为 3.2%；而之前的 2002~2007 年间 GDP 平均增速达到了 11.2%，CPI 平均同比涨幅仅为 2.1%。为应对危机，中国政府逐年分别实施了以“保增长”、“控通胀”与“调结构”为首要目标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虽然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一直面临着“保增长导致通胀明显上升、控通胀又导致增长进一步放缓”的两难困境。“增长放缓与通胀压力共存”的经济格局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宏观调控出现失灵的征兆。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处于滞胀的格局之中？总需求管理的失效是否与此有关？如果确实由于中国经济处于滞胀的格局导致当前总需求管理的失效，那么面对以往未曾处理过的复杂局面，中国可以从国际历史中借鉴哪些应对滞胀的成功经验，又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引领经济走出滞胀？回答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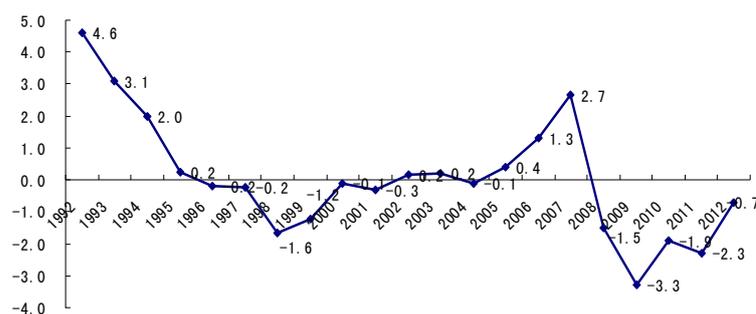
一、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格局的实质是滞胀，未来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或更加严重

1、2008 年以来，GDP 实际增速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在经济增长方面，我们通过对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发现，2000~2005 年以来中国 GDP 实际增速一直在潜在增长率附近区域内波动，2006、2007 年 GDP 增速明显加快，经济出现过热的局面。金融危机后，我国 GDP 实际增长率开始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由此表明，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开始呈现出增长率缺口为负的态势，并且在一直持续。

此外，如果考虑到政府大力刺激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实际内在动力将会更弱，停滞的状态更加明显。金融危机以来，美、欧等主要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导致我国出口下滑趋势显著。同时，由于社会保障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因素，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有效释放。因此，扩大投资成为政府保增长的重要手段。2008~2013 年资本贡献率平均达到了 56.3%；2002~2007 年平均仅为 48.5%。因此可以推断，当前自发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实际值更低，增长率的负向缺口更加明显。

图 1：1992~2012 年我国 GDP 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差值（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陈彦斌、姚一旻（2012）。

在通胀方面，金融危机以后，受供需关系的刚性影响，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大量的流动资金注入房地产市场，房价的大幅飙升。这两点大大推高了经济的运行成本，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

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增加企业生产运行成本，从供给端推高通胀水平。伴随着人口老龄化，我国劳动人口规模扩张势头逐步减缓，并在 2012 年首次出现同比下降。^①受供需关系影响，我国低端劳动工资保持了持续上涨的趋势。2009 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 1417 元，2012 年已涨至 2290 元，三年间的涨幅达到 61.6%。^②

房价不断上涨更是从成本和需求两个方面增加通胀压力。一方面，房价的不断上涨导致房租上涨压力加大、企业尤其是商业零售企业运行成本的上升、以及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③这些都会催生成本推动型通胀。另一方面，房价上涨拉动了投资需求的增长，当前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已占到总体投资规模的 20%，这直接增加了通胀压力。同时，房地产作为应用最广泛的抵押品，房价的不断上涨增加了企业所拥有的抵押品价值，增强了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能力，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需求，也从需求端推高通胀水平。^④

2、虽然当前中国宏观格局的表现形式与形成机理与 1970 年代发生的美、英滞胀有所不同，但实质就是滞胀。

传统对于滞胀的认识为，对供给曲线的负向冲击导致实际产出水平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的上升，即“经济停滞、物价上涨”。在 1970 年代美、英滞胀期间也确实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的年份。^⑤然而，简单的把这一判断标准套用在中国经济上，以当前 GDP 仍在中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2 年末，我国大陆 15 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93727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345 万人。2013 年末劳动年龄人口 91954 万人，比上年末减少 244 万人。

^② 数据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

^③ 根据百城价格指数测算，2008 年以来，北上广深房屋租赁价格指数平均涨幅达 43.4%，涨幅最高的为北京的 61.2%；写字楼价格指数平均涨幅达 32.6%，涨幅最高的仍为北京的 50.7%。在农产品方面，零售价与批发价的差距越拉越大已成为典型的事实，主要原因在于市场摊位费用的不断攀升。

^④ 资料来源：秦岭、姚一旻，《我国银行信贷与房地产价格关系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⑤ 美国在 1974、1975、以及 1980 年的 GDP 出现负增长；英国在 1974、1975、1980、以及 1981 年出现 GDP 的负增长。

高速增长就认为中国经济未进入滞胀的格局，这显然是忽略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形成机理，“中国式滞胀”与以往的滞胀有所不同，但实质就是滞胀。

第一，对于中国而言，“滞”的判断应以 GDP 的实际增速是否低于潜在增长率为标准，而不是简单的以 GDP 增速的正负来判断。西方对于“经济停滞”的解释为“实际产量或收入不变、下降或增长，但明显慢于所能达到的增长速度”，^①在一些主流的西方学术文献中对于“经济停滞”的判断也都基于实际的 GDP 增速是否低于潜在的增长水平。^②由于美、英等国作为发达国家，均衡状态下的产出水平已经相对固定，所以在受到供给冲击时会在一定时期内出现 GDP 负增长现象，即产出缺口为负的情况。^③但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对于经历了 30 年的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讲，潜在的产出水平也是在相应的增长，这样即使出现经济停滞，GDP 实际增速虽会出现下滑，但也肯定为正。就目前而言，7.7%的增速之所以不被认为是经济停滞，是由于还高于政府与民众 7%的可接受底线。如果中国 GDP 增速真跌至 3~5%，中国经济停滞将会成为共识，但以潜在增长率来衡量两者的实质其实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中国，应以增长率缺口，即以实际 GDP 增速低于潜在 GDP 增长率作为判断“滞”的重要标准。^④那么，2008 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处于“滞”的状态。

第二，“中国式滞胀”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增速的下滑，即先有“滞”再有“胀”，而不同于 1970 年代美、英先有“胀”再有“滞”的形成机理。美、英滞胀的根源在于石油危机产生的巨大负向供给冲击，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因此，当时最开始的突出表现为通胀率的大幅上升。当前，中国所处滞胀的根源则不同。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的严峻形势，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都先后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也不例外，为保证经济平稳增长与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规模大幅扩张。但这一举措不仅没有使经济增速的下滑趋势真正得到改变，反而过剩的流动性导致通胀压力持续存在。因此，金融危机后中国开始最突出表现为 GDP 增速明显下滑，带动 CPI 出现同比下降。随着宽松货币的推进，GDP 增速下滑趋势没有改变，而 CPI 同比涨幅却一直处在 3%左右波动。

总体而言，仅以 GDP 负增长以及未受到大的供给冲击就认为中国未陷入滞胀困局的观点是不准确的，2008 年以来中国所处的经济格局就是滞胀。明确“中国式滞胀”的表现形式与形成机理，对于判断中国真正所处的经济状态以及制定相应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3、中国未来的滞胀格局仍将延续，或更加严重。

第一，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难以扭转，GDP 增速将会阶段性下滑。众多学者及机构对

^① 资料来源：《现代经济辞典》，D.格林沃尔德，商务印书馆，1981 年。

^② 资料来源：Easterly, “Economic Stagnation, Fixed Factors, and Policy Threshold”.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4; Barsky, Kilian, “Oil and Macroeconomy since the 1970s”. NBER working paper, 2004.

^③ 1960 年代的美、英的平均 GDP 增速为 4.4%与 3.0%，在整个 1970 年代滞胀期间美国平均 GDP 增速也达到了 2.9%，英国达到了 2.0%，平均增速相差不大。

^④ 针对于中国实际情况，厉以宁、贾康等学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具体参见：《厉以宁：只要中国增长率降到 6%就会产生滞胀》，《中国企业家》，2010；贾康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财政研究》，2013。

于中国未来 5~10 年内的经济增速测算表明（如表 1），未来中国经济将经历结构性减速的阶段。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由于全球科技技术进步速度的减缓以及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深陷债务危机，^①外部需求难以出现明显改善，出口难以继续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二是，受制于劳动成本上升、资源不断减少、以及环境持续恶化等因素，支撑高投资发展模式的空间已经不大。依靠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也将逐步退出。三是，“后发优势”逐渐消耗殆尽，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接近生产技术的前沿，中国必须更多依靠自主创新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而这一转变并非易事。

表 1：一些代表性研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预测

研究者	预测期间	预测值（%）
陈彦斌、姚一旻（2012）	2011~2015	8.23（基准）
	2016~2020	6.5（基准）
世界银行（2012）	2011~2015	8.6
	2016~2020	7
张延群、娄峰（2009）	2011~2015	8.3
	2016~2020	6.7
Kuijs（2009）	2010~2015	8.4
	2016~2020	7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	2011~2015	7.8-8.7
	2016~2020	5.7-6.6

第二，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化解，成本推动型通胀更会长期存在。流动性方面，全球基础货币在金融危机后规模大幅扩张（如图 2），流动性过剩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善。由此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力量较为强劲，势必将加大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同时，国内由于外汇占款大量增加和四万亿导致的信贷大量增加等因素导致货币超发，虽然暂时被房地产与地方投融资平台吸纳，但从国际经验来看，长期内过剩的流动性将使通胀风险逐步暴露。^②成本推动型通胀方面，以往廉价劳动力、土地、要素资本的供给模式将会终结，环境成本将会被更加重视，这些都将在长期内逐步抬高经济的运行成本，使得成本推动型通胀加剧。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导致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求关系一直偏紧，^③未来粮食价格若无法保持相对稳定，^④将会给通胀增添风险。

^① 据 IMF 估计，发达国家政府总债务占 GDP 比重在 2011~2017 年都将处于历史高位。

^② 根据测算，2010 年以来，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合计流入房地产相关领域的贷款占新增贷款的比例在 28% 以上，其中 2010 年和 2013 年甚至超过了 40%。同时，约 20-30% 比例的贷款资金流入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

^③ 在过去的粮食十年连增中，除 2008 年、2009 年两年间粮食产出稍大于需求，其余年份我国粮食状况均是产不足需，且缺口日益增大。虽然官方多年来一直将 95% 的粮食自给率作为目标，但到 2012 年底，这一数字已跌破 90%。具体参见：《中国粮食安全报告》，《财经》，2013 年第 35 期。

^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指出：到 2020 年，按 14.3 亿人口、人均消费 409 公斤—414 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 58487 万吨—59202 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计算，届时国内粮食（不含大豆）的

图 2：全球基础货币规模变化趋势（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二、中国所擅长的宏观调控方法无法解决滞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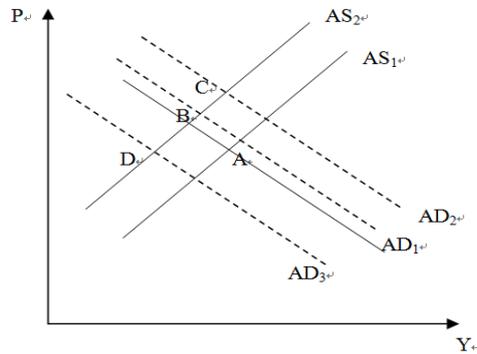
中国以往所擅长的是以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手段,通过合理协调搭配货币与财政政策实现对于需求端的把控。在金融危机之前的 30 年中,由于需求端既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也是通胀上行的核心压力,^①这一宏观调控方法无论是应对 1992 年后的经济过热局面,还是解决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增长下滑问题,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效。然而,对于当前“中国式滞胀”的困境,政府在这 6 年间延续了以往宏观调控的思路,不仅没有有效解决滞胀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滞胀的严重程度。究其根本,以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手段是无法解决滞胀问题的。

1、从理论上,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当前所处的滞胀定义有所不同,但也可利用传统滞胀的概念解释需求管理政策无法解决滞胀的原因。在滞胀时期,供给曲线左移至 AS_2 ,需求曲线受流动性过剩等需求端影响短期均衡点由 A 变为 B 点,此时物价水平上升而产出水平下降。如果使用需求管理政策扩大总量需求,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至 AD_2 ,交点为 C 使得产出水平恢复到 A 的水平,那么将导致均衡时物价水平更高,通胀问题加剧。同样,如果使用需求管理政策治理滞胀时期的通胀问题,缩减需求总量以使需求曲线向左移动至 AD_3 ,交点为 D 使得物价水平回归至 P,那么将导致均衡时产出水平更低,经济增速下滑更为严重。因此,需求管理政策从理论上无法妥善解决滞胀的局面,由于很容易顾此失彼,政策目标只能被迫的不断改变以保证经济增速与通胀程度处于可忍受区间。

供给缺口将在 4000 万吨—5000 万吨。

^① 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在这 30 年期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较大程度是依靠全社会投资增速加快所带动。而当经济局部过热时,政府也是依靠抑制投资增速,缩减需求规模使经济增速与通胀程度回归合理水平。(李扬、殷剑峰、陈洪波, 2007;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 2007; 刘金全、刘志刚, 2005)

图 3：需求管理政策难以妥善解决滞胀



2、事实上，2008 年以来中国所进行的在需求总量上的宏观调控的确收效甚微，始终未走出“中国式滞胀”的经济状态。金融危机以来，宏观调控的目标一直在“保增长”、“控通胀”以及“调结构”之间切换，实际上已经陷入需求管理政策应对滞胀的困局。具体而言，2008 年以来，宏观调控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政府大力度刺激经济需求成功实现了“保增长”的目标，但同时通胀程度显著增加。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为应对经济增速的下滑，2008 年 11 月政府出台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随后在 2009 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迅速由 2008 年的“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与防止明显通货膨胀”，转为“保增长、促发展”。^①相应的，央行将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的货币政策迅速调整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需求管理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在 2009 年一季度跌至 6.6% 之后开始回升，2009 年全年增速为 9.2%，完成了经济增长的目标。2010 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任务由于金融危机后外需的显著缩减，再次调整为“转变方式、调整结构”，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央行延续了 2009 年的货币与财政政策。2010 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了 32%，为 1995 年以来的最高点。受此拉动，经济增速继续回升至 10.4%。但此时，在滞胀时期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弊端已经显现。2010 年 CPI 同比涨幅达到 3.3%，而在 2009 年 CPI 同比下跌 0.7%，4 个百分点跨度是 1997 年以来最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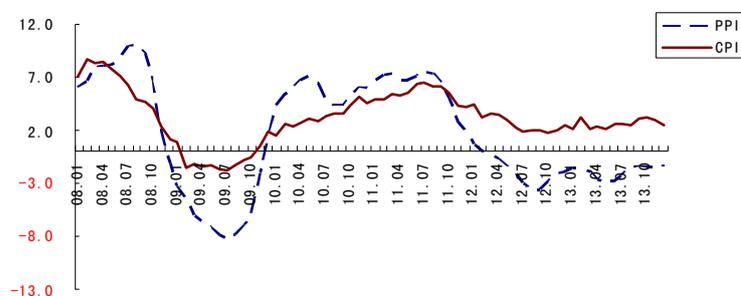
第二阶段，政府控制需求以稳定物价，不仅无法解决供给端的通胀压力，而且经济增速下滑幅度较大。由于 2010 年 CPI 涨幅明显，2011 年的经济首要工作任务再次转变“稳定物价”，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此时供给层面给予的通胀压力已显著呈现。一方面，输入性通胀压力加大。受全球流动性影响，2009 与 2010 年两年间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RB 已由 364.43 点大幅飙升至 629.53 点，涨幅达 70%。另一方面，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显著增强。劳动力方面，“民工荒、招工难”的问题已愈演愈烈，2010 年与 2011 年农民工收入增速均在 20% 左右；食品方面，食品 CPI 同比涨幅由 2009 年的 0.8% 迅速上涨至 2010 年的 7.2%，2011 年更达到 11.8%。因此，

^① 本文所引用的 2008~2013 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均是取自上一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内容。资料来源：2008-201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专题，新华网。

2011年CPI同比上涨5.4%，比2010年继续提高了2.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控制通胀的政策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至9.3%。

第三阶段，既不刺激需求拉动经济也不控制需求防止通胀，实施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但滞胀危机仍无法缓解。2012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将“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一并提出，2013年则延续了“稳中求进”的调控目标，两年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两年经济增速与CPI同比涨幅均为7.7%、2.6%，保持平稳。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12年起，PPI与CPI出现明显的背离走势（如图4）。截至2014年1月，PPI已连续23个月呈现同比下跌的走势。这意味着当前整体经济的生产环节依旧不活跃，而通胀的压力又长期存在，中国实际仍处于滞胀的经济状态。

图4: 2012年以来CPI与PPI出现明显的背离走势（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继续实施宏观调控的空间也在不断缩小，积聚的风险在不断加大，未来更加难以突破滞胀的困境。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指出，“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①

首先，政府债务风险逐步暴露，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逐步收窄。在多次财政政策的刺激下，由于地方政府在财权与事权上的不匹配，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变得十分突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余额达17.9万亿元，考虑或有债务，中央与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占GDP的53.2%。^②虽然未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但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风险将不断增大，“后遗症”将越来越多。

其次，当前我国M2规模扩张迅猛，M2/GDP已经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常规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使用空间大幅缩小。由于央行采取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为主，价格型调控工具为辅的货币政策，当前我国M2增速远高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从M2/GDP这一指标值来看，我国已居于绝对的历史高位：1986年，中国M2/GDP指标值仅为0.65，2007年为1.52，2013年该指标已达到1.95，为26年前的3倍。因此，在流动性已经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

^① 资料来自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5月13日。

^② 数据来源：国家审计署。

第三，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后发优势”的逐渐弱化以及当前严重产能过剩问题的警示，政府不应继续采取直接干预的产业政策。由于中国以往 30 年一直处于赶超阶段，经济的发展方向较为明确，产业政策确实起到了拉动经济的重要作用。但如今中国已逐步走在世界的前沿，政府对于未来的把握愈发不确定，直接制定产业政策往往形成了巨大的资源错配与产能过剩问题。^①因此，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利用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会带来一定的阻碍。

三、治理滞胀的国际经验——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

1970 年代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陷入了滞胀危机。1974 年美、英两国 GDP 同比分别下降 0.6%、1.3%，通胀率则达到了 11.0%、14.9%。起初政府继续实施以需求管理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不仅没有化解滞胀危机，反而使得滞胀愈演愈烈。1980 年美、英两国 GDP 同比分别下降 0.2%、2.0%，通胀率达到了 13.5%、19.6%。

里根、撒切尔夫人上台后抛开一直信奉的凯恩斯主义，将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着重实施了大减税、私有化、以及削减政府支出这三大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带领美、英走出滞胀。

一是，实施大规模减税，充分激发市场自主活力。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立足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回报率递减以及流动性陷阱”三大假设，认为政府必须通过扩张性的货币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实际上，由于政府支出需要大规模的税收，过重的税负抑制了企业的生产活力，产出水平无法与整体需求的迅猛扩张相匹配，这也成为导致滞胀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大规模减税成为从里根政府与撒切尔政府供给端管理经济的核心手段。政府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缩短资产折旧年限以及给予企业投资纳税优惠等手段，促使资本加速积累与利润的快速增长。里根政府在任期内先后两次分别对税率与税制进行改革，大幅度降低税率并简化税制，实施了美国历史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1981-1984 年间分三次降低个人所得税，从 23% 降至 5%；边际税率从 14%-70% 降至 11%-50%；资本收益税率从 28% 降至 20%，使 1981-1984 年间联邦政府税收减少了 3152 亿美元。^②大减税不仅增强了企业生产的动力，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生产的运行成本，对于解决滞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是，推进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于企业的控制，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战后，美英等政府对于经济运行的管理逐渐强化，形成了“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然而，国有企业规模过大并且效率不高导致了实体经济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里根政

^① 当前不论是振兴规划的十大产业的钢铁、船舶、有色金属，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光伏、风电等产业都已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现象。

^② 随后在 1986 年再次实施《1986 年税制改革法案》，把纳税等级从 14 级简化为 3 级，使最高税率从 50% 降为 35%，个人所得税降低约 7%；简化和改革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率从 46% 降为 33%。同时，对于厂房建筑、机器设备等折旧期限均大幅缩短。

府与撒切尔政府大力推动国有企业向私人资本出售，由此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在引领私有化浪潮的英国，撒切尔夫执政起至 1992 年，有 2/3 的国企被私有化。^① 与此同时，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意识到政府的干预过多相应的带来了巨大的管制成本，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经济运行效率低下，因此，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均主张将政府的干预程度降至最低，将“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充分激发私营经济的发展活力。里根政府在任期内放松了航空、铁路、汽车运输、电信、有线电视和天然气等诸多行业的干预与管制，并且，批准成立了放宽和撤销规章条例的总统特别小组。在 1981 年审核的 91 种管理企业生产经济的规章条例中，已经撤销或即将撤销的就达到 65 种。^②

三是，改革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削减政府预算支出。 二战后，美英等国都加大了社会福利支出。社会福利所涉及的范围与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广泛，福利标准也在逐步提升，从而导致福利支出规模急剧膨胀。以美国为例，1969 年总开支就达到了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4.1%。^③ 高福利一方面扩大了收入，增加消费需求，使物价即使在经济萧条时期也不会明显下跌，并且降低了人们就业意愿，难以有效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高福利加大了政府的支出负担，使得大减税等宏观政策难以有效实施。因此，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均不同程度的削减福利支出，推动福利体系改革。^④

总体而言，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关键在于把政府从之前与市场交织的关系中脱离出来，真正激发市场的自主活力，这也是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这一转变确实引导美英两国逐步走出了滞胀的泥潭，并且经济在此后的较长时期均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1983 年，在里根上任后的第三年，美国 GDP 由同比下降 1.9% 转为同比增长 4.5%，通胀率回落至 3.9%，并由此开启了美国的“大稳健”时代。同样，1982 年，在撒切尔夫执政的第四年，英国 GDP 由同比下降 1.4% 转为同比增长 2.1%，通胀率回落至 7.4%。此后，1982-1990 年间英国 GDP 平均增速为 3.5%，通胀率平均为 5.9%，而在滞胀时期 GDP 增速仅为 0.7%，通胀率达到了 16.0%。

四、治理中国滞胀需要大减税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当总需求管理政策陷入增长与通胀难以兼顾的困境之中，针对于“中国式滞胀”先有“滞”后有“胀”的形成机理，借鉴国际的历史经验，中国应先直接解决当前税负过重、政府干预过多、以及国企规模过大等供给端上制约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应抓住大规模减税与发展

^① 据世界银行估算，随着德、法、意等西方国家先后推进了私有化进程，九十年代初全世界每年将政府财产私有化的总值约五百亿美金，到 1995 年更增至九百亿美金。

^② 资料来源：王全兴、管斌，《经济法与经济民主》，《中外法学》，2002 年第 6 期。

^③ 资料来源：韩和元，《全球大趋势 2：被债务挟持的世界经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2 年 3 月 1 日出版。

^④ 英国 1986~1987 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比较 1979~1980 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里根提出的一揽子社会保障改革方案也得到通过 1982~1983 财政年度，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和食品券开支比 1981 年减少 13%，医疗补助减少了 5%，儿童营养补助减少了 4.4%，一般就业和训练基金减少了 35%，工作鼓励项目减少了 33%。

民营经济这两条主线。

1、当前财政收入增速仍较快、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应从“结构性减税”转向“大减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并增加居民收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4年分税制后，我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较快的财政收入增速意味着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不断攀升。众多学者及机构对于我国大口径下宏观税负水平的测算结果都在35%以上，已经介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水平之间。^{①②}与较高宏观税负水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福利支出一直占比过低，^③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支出一直是居民挥之不去的生活压力。《福布斯》公布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名，2005-2011年中国年年排进前四位，并在2009和2011年位列全球第二。尽管该指数的评价方法存有一些待商榷的地方，但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前宏观税负水平确实较高。

其实，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税负过重的问题，并尝试用“结构性减税”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但几年来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结构性减税”在2008年中央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并作为重要任务。但由于各级税收征管部门受制于硬性指标的考核以及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的刚性需求，结构性减税虽然使得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主体税种增速出现回落，但导致非主体税种与非税收入增速加快。^④《中国企业家》最新调查也显示，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的税负依然较重，九成被调查企业认为结构性减税不到位。^⑤甚至部分中小企业已经到了不逃税漏税就无法生存的地步。^⑥因此，若要真正达到降低宏观税负的目的，应从“结构性减税”转变为“大减税”。

“大减税”的意义不同于“结构性减税”的零敲碎打，而是直接能够从总量上看到宏观税负的下降。“大减税”的着力点在于中低收入群体与民营企业这两个层面。一方面，通过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起征点等方式，直接减轻中低等收入群体的税负；另一方面，全面降低民营企业所承担的税费成本。根据工信部调查当前企业整体的毛利率比利润率15个百分点左右，^⑦税费已经成为抑制企业生产活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要通过“大减税”促进民营企业发展，为经济注入活力。当前，如果能将宏观税负由35%降低到25%，就将约有约5.7万亿资金转移回到企业的生产环节与居民的日常消费中去，这相比于政府的大量低效率投资与铺张浪费的“三公”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大大的提高。^⑧

^① 社科院研究院（2012）测算中国宏观税负水平约35%；许善达（2012）同样测算得到中国政府收入约占GDP35%、宏观税负不轻。此外，还有一些列文章都指出我国宏观税负在35%以上。

^②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在2013年上半年发布的《2013年上半年产业经济运行分析及建议》指出，我国企业综合税负水平已经达到了40%左右，超过了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

^③ 发达经济体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是财政总支出中的最大项目，一般都在30%以上，美国为45%，德国更是高达71.49%，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到30%。具体参见：中国经营报，2012年3月19日。

^④ 以2012年为例，增值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的增速均有所回落，分别为8.8%、13.5%与15.1%，而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以及非税收入的增速持续较快，分别达到了26.1%、31.8%、50.7%和17.7%，远高于12.9%的整体财政收入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⑤ 资料来源：《中国大规模减税时机已经成熟》，人民日报，2012年3月7日。

^⑥ 资料来源：《中小企业的逃税生存》，《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50期。

^⑦ 工信部（2013）发布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指出，被调查企业总体毛利率达到了19%，说明企业控制成本能力较强，具备一定的获利能力。但平均利润率只有5.1%，扣除所得税后的净利润就更少，说明企业税费负担比较重。

^⑧ 严成霖、龚六堂（2012）通过定量分析测算也证明了，如果若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5%

2、打破行政垄断、消除信贷歧视，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针对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若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必须要改变当前民营企业所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第一，由于行政干预的力量存在，民营企业难以进入部分高利润的垄断行业。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市场准入机制的逐步完善应是必然趋势，但我国对于垄断行业的改革却迟迟难见实质性的进展。无论是石油、电信、电力、铁路等自然性垄断行业，还是供水、热力、燃气等区域性公用事业，以及本应属于竞争性行业的飞机制造业、机车制造业等行业，都被国有资本牢牢的掌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2013）》显示，当前垄断行业总量已约占我国 GDP 的 40%。^①国有经济规模与控制范围的不断加大，将直接挤压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

第二，民营经济面临严格的信贷约束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形成鲜明的对比。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家的大量补贴与扶持，运行中所承担的风险更小，因此更容易获取国有银行的贷款。^②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借贷成本至少为基准借贷利率的一倍以上，^③甚至在流动性收紧时，只能借助高利贷维持经营。^④因此，在信贷歧视存在的市场环境中，一方面，国有经济在预算软约束下负债水平不断攀升，经济效率难以提高；^⑤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举步维艰，被迫退出市场。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国民营企业仍在逐步的发展壮大，当前贡献 GDP 总量的 50% 以上，提供了 70% 以上的就业岗位，这足以看出我国民营经济的内在动力实际上十分强劲。因此，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国家更应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切实解决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真正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的对待，释放民营经济中所蕴含的巨大内在动力。

总体而言，无论是“大减税”还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都需要重新定位在滞胀时期政府的作用。“大减税”需要以缩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性支出为前提；大力发展民营经济需要以大幅减少政府对于微观经济的干预为保障。因此，打破政府的既得利益，明确政府的服务职能，是中国通过供给管理走出“中国式滞胀”的关键。

提高至 35%，经济增长率将降低 2.55% 若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 25% 减少至 15%，经济增长率将上升 2.71%。

^① 相应的，国有企业的资产规模也在急剧的扩张。2007 年国企总资产为 34.2 万亿，截至 2013 年底国企总资产规模已达到 91.1 万亿，扩大了 1.6 倍，增幅远超过 GDP。数据来源：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② 2001~2010 年，国有银行将超过 80% 的信贷资金投向占企业总数不到 1% 的大型企业，占企业总数 99% 以上的中小企业只能获得不到 20% 的贷款。具体参见：证券时报，2012 年 4 月 5 日。

^③ 资料来源：《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到底有多高》，证券日报，2013 年 9 月 17 日。

^④ 资料来源：《中小企业被高利贷绑架》，经济观察报，2014 年 1 月 13 日。

^⑤ 中国社科院在《经济蓝皮书》中指出，仅仅电力、电信、石油、铁路四个行业的效率损失已经达到每年 GDP 的 10% 以上。